

樊 纲

中国著名
经济学家讲演系列

盛 洪 / 主编
天 则 十 年 丛 书

驾驭脆弱的世界

Reining Brittle World

 郑州大学出版社

樊 纲

驾驭脆弱的世界

Reining Brittle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驾驭脆弱的世界/樊纲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

(天则十年丛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讲演系列/盛洪
主编)

ISBN 7-81048-862-7

I. 驾… II. 樊…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036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邮政编码:450052)

出版人:谷振清

发行部电话:0371-696607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635 mm × 960 mm

1/16

印张:11.75

字数:156 千字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1048-862-7/F·35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 1 ·

72 65 56 46 41 31 25 17 1

「驾驭脆弱的世界」

『崩溃论』与中国经济



第一讲

新世纪中国改革的前景与难题



第二讲

改革的动力和阻力



第三讲

『状告政府』：发展法治与改革『制度创新的制度』



第四讲

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年后的思考



第五讲

全面理解中国的资本市场



第六讲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七讲

温州经验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第八讲

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与政策



第九讲



目录

· 2 ·

146	137	135	132	122	117	111	100	88	83
收入差距与分配制度改革	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	全球化与中国	驾驭脆弱的世界	在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中争取自己的利益	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政府体制改革	中国加入WTO不会是灾难也不会是奇迹	中国尝到了加入WTO的甜头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战略	中国制造业拿什么奉献给21世纪
									
第十讲	第十一讲	第十二讲	第十三讲	第十四讲	第十五讲	第十六讲	第十七讲	第十八讲	第十九讲

目录



169 156 153

中集经验与中国传统产业的发展



第二十讲

『新经济』批判



第二十一讲

在经济改革中发展经济理论



第二十二讲

第 1 讲

“崩溃论”与中国经济^①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来此与大家讨论问题。今晚有世界杯足球赛,德国和韩国的半决赛,大家不看球赛来听讲座,我深表感谢。

正如刚才主持人所说,前一段时间,国际上有一种“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出现所谓“崩溃论”并非偶然,世界上确实有人不愿看到中国崛起,甚至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他们看到中国吸引了那么多外资,就想喧嚣什么“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以阻挡更多外资进入中国。其实,“崩溃论”不过是老调重弹而已,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有几次“崩溃论”在国际上闹得很凶: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1997~1998年一次,都曾有人说过“过不了几年,中国经济就会崩溃”。然而,他们希望看到的崩溃局面始终未能出现,却没人出来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大家也忘记做个记录,好事后评判一下是否说得对,于是,耸人听闻的人也就总有市场。

在中国找问题并不难,各个领域都存在问题,真正的难题在于:第一,解释“中国有这么多问题,怎么经济还在增长,而且势头还不错”;第二,寻找解决问题以及防止问题出现的办法并提出明确的建设性主张,这才是真正最难的。说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也不



① 在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举办的“名人论坛”上的演讲。

是事实,我们不仅要看到问题,还要分析问题,更要解决问题。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就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正视问题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也是回应所谓“崩溃论”的根本方法。

一、作为转型经济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中国经济其实面临两大系列问题:其一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就是发展问题,比如“三农”、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法制不健全、腐败问题等等;其二是所有转型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即体制改革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法律结构问题等等。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银行坏账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通病,东欧一些国家的银行坏账与我们几乎一模一样。再比如在俄罗斯注册一家私有企业,仅公章就要盖 800 ~ 1 000 个。俄罗斯搞了多年自由经济至今仍未发展起来,原因可见一斑。而最近的一个报道说我国青海省的一个地方办同样的事,盖公章需要 115 个。从这一点说,我们已经先进了 10 倍。

两大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再加上 13 亿人口和宽广的地域,使得中国许多问题堪称世界之最。银行坏账是世界之最,失业、就业人口也是世界之最。迄今为止,我们已有 2 500 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下岗。如此大的规模不出事才叫怪事,没出大事就是伟大成就。

这么大的问题,决定了中国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我们的改革已经过去了 20 多年,今后还需 20 年、30 年甚至 50 年。我曾说过,中国若能用 70 年时间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比起欧美国家用三四百年才建立起市场经济仍是伟大的成就。这些问题要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渐得到解决。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冷静对待和分析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实行改革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也恰恰因为这两类问题交织在一起。俄罗斯、东欧等其他转型国家则不同,在改革之初它们已实现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

90%以上人口是国有企业职工,几乎100%的人口享受社会福利。而中国改革之初还基本属于农业社会,80%为农业人口,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不超过20%,这反而使我们的改革相对容易些。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就像分割一块蛋糕,苏联、东欧是在蛋糕不再增长的情况下重新划分比例,这就构成尖锐的利益冲突;而中国是在蛋糕增长的过程中实行改革,每一块蛋糕都在增长,没有绝对缩小,因此利益冲突相对缓和一些。中国经济能实现渐进式平稳增长,恰恰因为中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会有很多问题,但有希望在增长中得以解决。

二、关于金融风险

在金融领域,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就是银行坏账,这个问题在我国的确相当严重。据最近公布的数字,我国目前银行坏账占总债务的25%到26%,全部银行系统坏账占GDP比重的26%到27%,再把由于债转股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加起来,约占GDP比重的40%,堪称世界坏账之最。日本也被银行坏账困扰,但只占GDP的10%。为什么日本10%都受不了,而中国的坏账数额如此之大而银行还在正常运行,老百姓还在往里存款,而且经济还在以7%至8%的速度增长呢?这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银行坏账属于国债,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而且多半是在政府干预下进行的,是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正常运转给企业的补贴。按经济理论说,这属于“准国债”,最后要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这就要求我们将银行坏账与政府债务两者结合起来分析。这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债务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属于最低的,占GDP的比重不过16%。按欧盟国家实行欧元时所制定的标准,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不得超过60%,而意大利现在是90%,日本接近140%。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债务比较高而政府债务比较低呢?原因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搞了“拨改贷”,即政府基本不再给国有企业拨款,多数企业从初始投资到运行资本直至亏损补贴,都由银行来负责,国家财政并不拿钱,用的



是政府所控制的老百姓储蓄,银行成了政府的另一个口袋。政府所给予国有企业的投资、补贴,并没走国家财政的账,走的都是银行的账。加上过去几年几乎没有财政政策,也没搞过发债,所以中国的国债占 GDP 的比重较低。此外,我国的外债占 GDP 的比重也很低,只占 15%,其中短期外债只占 1%。而韩国在 1997 年危机之前短期外债将近占 GDP 的 40%,泰国将近 30%,还有股市上有大量的热钱,导致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如果不算长期外债,我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大约是 57% 到 58%,如果算长期外债,是 71% 到 72%,基本还在警戒线内。因此,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总体讲金融风险还不是很大,即使有风险也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实际上中国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为国内信贷的危机,即“银行惜贷”。银行之所以惜贷就是由于出现了高额坏账,政府不得不把控制银行坏账当作首要任务而采取一系列措施。这样,银行即使不要利润,也不能再出现坏账,因此导致惜贷。原来的主要客户是国有大企业,但它们几乎都债台高筑,小企业又不能做,就必然导致信贷萎缩。从 1996 年开始的信贷萎缩是中国最近几年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但这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国际收支的支付危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经济整体,对外赖账的危机是非常危险的,而中国在此方面甚至是过度保险。现在我们的出口顺差是 200 多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有盈余,外汇储备已超过 2 300 多亿,今年有望达到 2 600 多亿。对于一个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本来我们缺资金,应该从美国吸引资金,但现在要用它来买美国国债,等于中国人把钱借给美国政府。但从国际收支角度看,这 2 300 多亿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保险作用。我们不存在支付困难问题,外部平衡相当好,人民币已成为强势货币,而且具有升值的压力。再加上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有危机也只是内部危机,发生像东南亚国家那样的国际收支的支付危机就目前来看可能性非常小。

然而,1997 年 10 月以来我国发生的通货紧缩说明我们的金融





领域确实有问题,特别是银行体制问题,只不过还没严重到使我们陷入危机的程度,没惨到像韩国人用首饰还外债的地步。但这些问题反映出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我们在所有竞争性领域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惟独银行领域始终被政府严格控制。再加上使用贷款的大户仍然是国有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改革又不彻底,结果导致能够创造产值、创造就业的部门拿不到更多金融资源,而不创造产值的部门却过度占有金融资源。现在非国有企业创造的产值约占 GDP 的 70%,而其所用金融资源还不到 30%;国有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 GDP 的 30%,却拿着金融资源的 70%。这种分配体制导致了资源分配的扭曲和无效率,由此产生许多问题也是必然的。最近人民银行表示要组织讨论发展民营银行问题,这是自改革以来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政府控制的民营银行不能叫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有发展民营银行,可见金融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

再说说资本市场。过去资本市场也主要是为国有控股企业融资,民营经济很少有融资渠道,所以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原因也仍然存在,于是产生了不少的“坏股”,上市公司“空壳化”等,并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也要看到我们还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如果一方面严格控制银行坏账的增长,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整体增长,寻找到包括资本市场和民营银行的增长点,让金融资产进一步增长,坏账问题就可在改革和增长过程中逐步得以解决。坏账有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与 GDP 的比例关系。假定现在是 40%,通过改革和内部监控等手段,只要使坏账的绝对值不再增长,而让作为分母的 GDP 增长,若以分母每年增长 8% 计算,7 年就可减一半,用不了几年就减下来了。由此看来,清理存量不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必须尽快把坏账增长制止住。因此,清理坏账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其放在企业账户上,让它作为改革的压力,然后在增量上做文章,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可以看出,虽然金融、财政、资本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问题,但它们都在可控制范围内,在3至5年内不会出现大的危机。若积极改进工作,还有机会解决这些问题。渐进改革不是一下子把事做完,而是一步步地走出困境。但最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为了维持短期稳定,怕打破一些旧有规矩造成短期混乱而不去改革,把一些本来可以现在做好的事推到未来去做,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三、关于收入差距与社会矛盾

改革必然会伴随许多社会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拉大、职工下岗、犯罪率提高等。哪个问题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明确两个概念,即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

绝对贫困是以绝对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的,比如没吃没穿,这叫绝对贫困,它是个静态指标。而绝对贫困化是个动态指标,指今天的绝对收入低于昨天的水平,即使没到绝对贫困的地步,但收入的绝对水平下降在理论上就被称为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是指绝对生活水平在提高,但与他人相比收入较少,农民、职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年,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都在提高,但社会上另一些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因而形成相对贫困,即出现所谓“不患寡,患不均”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里,这些问题也普遍存在,都会构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冲突。那么,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呢?就我国目前来说,绝对贫困确实在缩小,现在只有2000多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政府对此也有适当补贴。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相对贫困化,如何防止绝对贫困化的大量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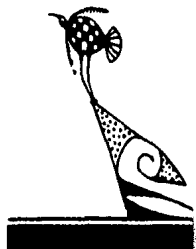
改革和发展引发的相对贫困化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就是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绝对平均主义问题,就是要把收入差距拉开。如果收入差距没拉开,那等于没有改革。拉得太大了就要调整,但绝不能否认差距拉大的过程,而且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这个差距可能会继续拉大。因此,相对贫困化目前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做的是采



取措施遏制差距速度的过快增长,比如希望富人多交点税,为社会多做贡献等,以此弥补收入的距离。那么,什么情况会造成大的社会波动呢?这就要关注绝对贫困化问题了,只要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不断提高,大多数人不发生绝对贫困化,社会就能基本稳定。

农民不一定会出现绝对贫困化。农业已不再是收入增长的源泉,但这些年农民靠外出打工,收入有所增长,非农收入还是在增长。

收入发生绝对下降的最大群体是下岗又没找到工作的一批职工。中国这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加上大集体下岗的约有4000万人左右,目前还处在下岗状态的至少还有七八百万人。这么庞大的人群为何没发生大的动乱呢?当然这与政府积极工作有关,但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群体感觉绝对贫困化的程度并不像其工资变化显示得那么大。



现在难以再找到工作的人,主要是四五十岁的人,这些人有上个世纪60年代挨饿的记忆,有“文革”动乱的记忆,有上山下乡、商品短缺时代的记忆,他们潜意识里还在不断地把现在的生活与20年前作对比。若是年轻人下岗又找不到工作就不同了,他们生下来过的是一路上升的日子,参照系高就容易出问题。可见,绝对贫困化不是不存在,只是没那么严重,弱势群体的忍耐力还比较强。

即使这样,潜在的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要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该做的工作必须要做,最好是将这些下岗人员用社保的方式保起来。政府在这方面花一点钱进行补贴,一次性解决这个历史性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代人的问题。我曾建议对45岁以上的国有企业职工划一条线,以社保形式保起来。找不到工作的,政府下发失业补贴,以维持其基本生活,让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以避免这批人产生绝对贫困化。这批人过去是国家主人翁,对他们不能再做买断工龄的事了。如果把

这笔钱作为社保费,算算账,划划线,国家还是负担得起的。

四、城乡差距与“三农”问题

城乡差距问题主要体现在“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其中大部分为农业人口。

加入 WTO 后,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根本出路是让农民不再成为农民,这一问题是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就看这次能否彻底解决。现在农民收入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农民不断从农业转移出来,不断在非农产业里获得就业机会。已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城里的约有 1.5 亿到 2 亿人,大概还有 3.5 亿到 4 亿农村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这些人基本都要转移出来。依靠现代技术、农药和机械化,耕种有限的土地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人。在未来四五十年内,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要有 4 亿到 5 亿农民转移出农业,这也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农业实现产业化。目前美国的农民在劳动力中的比例是 2%,日本是 7%。要接近这样的比例,对中国来说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发展的问题就是要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能否走出土地,是经济能否持续增长、能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关键,这是人类的一大难题。有人觉得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是贬低了中国,认为中国应成为科技中心。依我看,即使中国真成了科技中心,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必须要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要靠制造业的发展为几亿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业问题可以不是一个城市必须要解决的,也可以不是企业必须要解决的,但最终是中央政府必须要解决的,因此,政府绝不能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人们讨论提升产业结构时往往有一个误区,以为提升产业结构就是只从事高级的产业,不屑于从事低级的产业。依我看,中国最多只能说扩充产业结构,可以从事高级的,但低级的也绝不能扔,这是我们的特殊国情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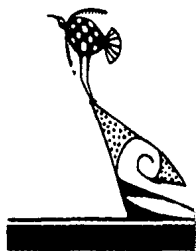


五、东西部地区差距问题

国际上也很关注我国的地区差距,但我看这还不是太大的问题。首先,中国并未出现哪一省、市、区因为富或穷而想分裂的倾向。从历史上看,我国就是一个最愿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曾有过一些民族矛盾,但从未出现过落后就造反的局面。市场经济更把贫富地区的统一加强了,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比如前些年香港不愿意在内地共同搞开发区,可现在却很积极。

另外,人口移动也在不断缩小地区间差距,将来中国东西部差距的缩小,人口移动将起重要作用。现在内陆地区经济不很发达,就业机会不多,收入不高,但内陆地区的人可以转移到沿海地区就业。我曾考虑做一个研究各省 GDP 和 GNP 差别的课题,GDP 是一个国家、地区的国民总产值,而在国外的产值要算到 GNP 当中。GDP 是要把一切外来人口在本地所创造的产值都要算进来,现在沿海地区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价值,其 GDP 要缩小一大块;内陆地区如果加上本地民工在外地创造的产值,它的 GNP 要增加一大块。

再谈一谈有关政府投入的问题。总有人说西部开发的资金投入没效率,如公路修好后没多少车,也没回报,资金运用不合理,深圳、上海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车很密集,应该多到这些地方修路。但我说这个资金投入恰恰是合理的,因为沿海地区的公路已经有回报了,就不应再由政府去修,民间就可以做到。政府的重要功能就是创造社会平等,要多在那些没有回报的地方投入。一方面是为落后地区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从社会平等的角度说,内陆也需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投入。越是没能力修路的地方,恰恰就越应是政府扶贫的对象。政府在落后地区投资,成本可能要比沿海高,但政府投资改善了那里的基础设施,也改善了投资环境,可以带动其他投资者,就会逐渐使那里的经济得到发展。但是,不管内陆经济怎样增长,也不能指望其经济规模、经济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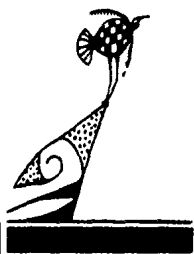
的活跃程度会像沿海地区一样,因为运输成本、地理位置是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消灭地区差异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因为,发达地方 GDP 多,但瓜分的人也多;落后地区 GDP 小,分享的人却较少,最后也能均等,所以,实现人均平等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曾说过,中国的“东西问题”可以解决,而世界的“南北问题”无法解决。因为世界的“南北问题”是穷国和富国的问题,而全世界的劳动力是无法自由流动的。我们要逐步解决劳动力流动问题,并要为此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缩小地区差距逐步实现均等,这可能需要三五十年时间。大陆国家都有类似问题,美国在 20 世纪初,有大约 50% 左右的人口分布在内陆地区,而现在 80% 的人都在沿海地区,地区差距也是逐步缩小的。

以上所讲的都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也是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它们将长期伴随我们的经济发展。只要改革在进行,经济在发展,就必然会有这些问题存在,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的过程。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平稳发展,避免崩溃的出现,还需继续深化各个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还要控制坏账问题;还应采取一些积极的收入对策、社保对策,来尽量减少绝对贫困化人群的扩大;还要促进农民的转移,促进人口流动。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就不至于崩溃。

当然还有没讲到的问题,比如腐败、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我只从经济角度讲了以上几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而要经过相当长的阶段才能逐步解决。关键是在各个领域如何把改革继续向前推进,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我看三五年内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崩溃,如果把现在的工作做好,再过三五年时间就能进一步走出困境。如果以动态眼光来看,中国经济确实还会避免崩溃。

对于中国来说,本世纪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这 100 年中国没追上发达国家,或许就永远追不上了,中国人的世界强国之梦就再也无法实现了。所以,谁要用各种借口来阻挡改革,使中



国社会潜在的危机得不到解决,那才是真正的民族败类。

谢谢大家认真听我讲。

现场问答

问:非常荣幸听樊教授讲课。有这么一句话,“经济学家是全民的经济学家”,樊教授正是站在全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我想请教一下在中国当前的诸多问题中,金融是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其症结何在?

答:金融问题的症结是产权问题。到目前为止,银行的改革还没有触及产权问题,既没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也没发展新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特别是民营的金融企业。资本市场基本上没对民营企业开放,证券公司对民营开放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就金融系统而言,过去在管理、监控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在产权方面一直没做。别的方面都往前走了,惟独这一问题没解决,因而成了制约发展的瓶颈。

国有企业改革的症结也是产权问题。产权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资本市场。就拿处理违规来说,证券、资本市场的违规,民营企业都好管,罚他倾家荡产,罚他出局、摘牌、财产抵押都可以。国有企业怎么罚?罚了谁去坐牢,谁承担责任?债转股当然有历史问题,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推脱责任。美国债转股倒真起了作用,结果是一大批人蹲监狱,一大批人自杀。而我们的债转股轻轻松松,根本起不了作用。所以,从管理角度看,要有产权约束,而且要更严格一些。

问:听您的讲座,感觉您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的。关于债务比重,我记得去年财政部领导在谈到会不会发生财政危机时曾提到,中国的赤字率只有2.8%,不会发生财政危机,因为警戒线是3%。但从今年看,如果再花掉1500亿,肯定要超过

